

历史在无声处发声

——再走丝路 □肖云儒

伊朗古都设拉子市，就是波斯波利斯即古波斯之都，是“万王之王”大流士一世建都的地方。宏伟的波斯王朝遗址和波斯帝王陵遗址，连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伟大的帝王和伟大的王朝，成为每个伊朗人的自豪。波斯波利斯遗址其实还不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宫所在地，它只是波斯帝王的觐见大厅。这里有“万国门”，有“百柱宫”，有体量惊人的厅堂，总建筑面积达到14万平方尺。波斯帝王就在这里会见各国使臣，接受他们的朝拜和贡品。

当时的波斯是世界上惟一横跨亚欧非三大州的大帝国，东至印度河流域，南至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西至欧洲马其顿和北非利比亚，北至咸海和高加索。遗址入口处的牛头人身雕塑，就来源于两河流域文明，墙体精美的浮雕，是埃及人的作品。高大的石柱，来自小亚细亚的工匠手艺。墙体的浮雕表现周边民族带着各种奇异珍宝前来觐见的场景，反映了那段历史的辉煌。导游给我们描绘当时的情景时，充满了民族自豪：埃及人服了，带着马来了；阿富汗人服了，带着布匹来了；巴比伦人服了，带着骆驼来了……

许多人都将大流士与秦始皇相比，将波斯王宫、王陵与秦咸阳宫、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相比，这个类比很是契合。大流士是波斯古国的“万王之王”，他以近20场大战建立了波斯帝国，立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省体制，统一货币，重定税制，修建驿道，集聚信仰，定拜火教为国教；秦始皇逐一打败六国，建立了中华帝国，统一了中国的文字、道路、货币和社会管理。

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我们能够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历史，而历史有时，不，应该说是同时会发出一种无声之声，只有那些有心有思的人，才能听见

这种掩埋于历史深处的无声之声。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种惊人的相似性：两个强大的帝国，竟然都在不长的时间内覆灭了。他们留下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也都同样遭到了大火焚毁的厄运。

——马其顿王国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三战而击溃兵力远胜于自己的波斯帝国，一把火烧掉了波斯波利斯，“百柱宫”如今只剩下13根残柱。

——击败秦王朝之后，率先进入咸阳的项羽，也是一把火烧掉了咸阳宫和阿房宫，就连其时已入殓于陵墓为秦始皇陪葬的兵马俑坑，也逃不掉火燎烟熏的命运。

两个王朝的命运为什么如此相似？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穿透了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历史情境，而根植于历史规律和历史哲学之中。这个原因像是种子，一开始就和稻种、麦种混在一起，在两个王朝兴盛之时便埋下种子，这种子随着两大王朝的发达而暗中生长着自己的穗叶。这种种便是“过度”两个字。过度的好大喜功，过度的征讨战乱，过度的国力消耗，过度的苛待周边的属国，过度地对民众予取予夺，等等。尽管它们在程度上有所区别，大流士一世比秦始皇稍显宽容。

秦国是在近百年间，以93次残酷的大战和400万人的生命作为成本，取得对六国的胜利的。之后秦始皇又修长城，修直道、驰道，修陵墓，动辄征用民夫、战俘、囚徒数以万计，可以想见其中拆解了多少家庭，离散了多少骨肉，流淌了多少血泪，有多少孟姜女想扑上去哭倒长城……大秦帝国是秦始皇一手建立的，大秦帝国其实也是秦始皇一手掏空的。所以陈胜、吴广，一群殊死而搏的奴隶夫役，一旦揭竿

而起顷刻便动摇了这个帝国的根基！

宏大的历史走向，从来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某件事，主宰它的是“势”。势是什么？就是民心背向，就是社会、政策和道德的总体取向。秦帝国的迅速覆灭，与具体人虽不无关系，根本上乃是“大势已去”。大势既去，精明强干的秦始皇就是从陵墓里爬出来也是无济于事了。

大流士一世也差不多，先是不到一年打了18次大战，铲除国内四面八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波斯。此后20余年中，向东打印度，将其收编为波斯帝国的第20个行省。朝西打色雷斯，三次远征希腊未果。全国政军分治，将兵器、舰艇的制造等备战措施，放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之上。这不但耗尽了自己的帝国，还殃及希腊。波斯三次远征希腊，希腊为了不在希波大战中亡国，全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结果导致了人类古文明瑰宝——希腊文明的衰落。故而波斯帝国的覆灭，深层责任也并不在大流士三世，而在他爷爷大流士一世。这位铁血大帝也是在创建自己王朝的同时掏空了自己的王朝，在张扬强盛之势的同时，暗中积累了颓败之势。到了大流士三世，败势既成，大势已去，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顺势而为，摘了个大桃子而已。这种开创者同时成为掘墓人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能够见到。不以过度的战争和建设耗尽国力民力，在需要与可能之间，目标与现实之间，规模、速度与力量之间，能否量力而行，审时而动，度势而为，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处理，是考验每个人，尤其是考验伟大人物的一道难题。过犹不及，欲速不达，晓晓者易缺，敝敝者易污，都说的是要讲究度与势。度与势不屈从个人欲求，规律不相信眼泪。不

尊重规律，炮火越猛后座力越大，反推力可能将枪炮手击倒。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也是许多让人不解的历史现象最深层的原因。

汉高祖刘邦也许觉悟到了亡秦的教训，他信奉黄老之学，放慢步子，以退为进。西汉初年的文士贾谊则以一篇《过秦论》让天下人振聋发聩。他主要从内因对秦朝的短命进行了透析，鞭辟入里地追问、思考了秦之过，秦皇之过，为不再重蹈覆辙敲了警钟。到了刘邦的孙辈，更施行了文景之治，在疗救中行复苏，从韬晦中谋发展，不到百年便仓粟殷实、钱库充盈，走出了秦末的大凋零，渐渐显出民富国强之势。这才孕育了又一位一代天骄——汉武帝。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一个积蓄——释放——再积蓄——再释放的辩证过程，以释放拉动积蓄，以积蓄充盈释放，实现良性的循环。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总是一成不变的强拍子、快节奏，何谈节奏？没有了节奏，又何谈呼吸吐纳，何谈发展的可持续？

夕阳西斜，黄昏的影子一点一点爬上土岗，吞噬着四个呈十字架形的阿契美尼德三代帝王陵墓。参观之后我们向它道别，心头忽然有所触动，一绺淡淡的苍凉，才下陵头却上心头！历史无声而岁月有痕。

这时，有五六位伊朗游客热情地向我们问好，好像是一个三代的家庭，真诚的笑容带过来一个亲和的气场，我突然想起随身包里带着的一名西安中学生在13岁创作的秦始皇兵马俑版画，我通过翻译给他们讲解这版画的内容。我说，大流士是波斯古国的“万王之王”，他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波斯古国；秦始皇是中华古国的“千古一帝”，他建立了中华帝国。今天在大流士王陵前将《秦始皇兵马俑》版画赠送给伊朗朋友，可以视为两个伟大国家相隔两千多年、两万多里的一次握手！我说我十分高兴能将中国青少年的情意传达给伊朗朋友，为了我们两国历史上的辉煌，也为了我们愈来愈深厚的友谊，为了一个没有战乱没有苦难、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



为了消亡的记忆

□俞云龙

村边的河滩树荫下，我们一群光屁股小孩，仰躺在松软的草地上，听树上的知了在叫个不停，看头顶的蓝天飘过片片白云，享受着丝丝凉风的吹拂；猫腻了，又钻入水中嬉水，玩起捉鱼比赛，那鱼很好捉，一会儿就被我们用柳条穿起一串，接着几个孩子又玩起捉知了的游戏。渐渐的，日渐西沉，美丽的晚霞中，我们提着那串鱼，回到家中等着各自父母的夸奖……童年就是在这样无拘无束的自然中成长。

年龄渐长，我们开始为各自的家中分担些许家务，或拔猪草，或捡柴禾，或替母亲烧饭，或帮父亲种菜浇水，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也渐渐少了。很快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村中的破寺庙就是我们的学校。破寺庙里有许多宝贝，比如同学们经常捡到三两枚铜钱，以及各种佛像的装饰品。寺边有棵空心大樟树，可以进出孩子，我们经常穿过黑黑的树洞，既刺激又怕被樟树精捉去。因为长辈们说那樟树是有神灵的，小孩子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就要被捉去受刑罚的，所以我们很怕，但又忍不住好奇。那份顽皮，那份淘气，不知换了长辈们多少的教训。

村里有五保老奶奶经常要到学校给我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村里不少人被鬼子杀了，还烧了房子，老奶奶告诉我们，那时她也刚成人，为了躲鬼子，

抒怀

老夫九十三，从小就嘴馋，食粥要有味，菜好才吃饭。最爱吃甲鱼，也爱鲑鱼干，可惜没了牙，对之空白叹。

念张天翼

今年是作家张天翼同志诞生110周年。他又是我们儿童文学的前辈。我很可惜没有机会见过张天翼同志。

我小时候在广州就读张天翼同志的儿童小说《奇怪的地方》。抗战开始时，他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可说是风靡一时。后来他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大林和小林》《罗文应的故事》等，小朋友太熟悉了。他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祖之一。

我没机会见到他，他却知道我。解放初期，南京图书馆设儿童阅览室，邀请张天翼同志主持开馆仪式，张天翼同志跟他们说，何不就近请任溶溶来主持呢？于是南京图书馆就来邀请我。张天翼同志这样关爱后辈，我实在感激不尽。

我至今就是可惜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向他当面请教。不过他这样关心我，我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要把儿童

病中三记

□任溶溶

文学工作好好做下去，并且以他为榜样，多多鼓励年轻作家写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窗前的树

我每天看着窗前的树，会想起它当年是我父亲亲手栽的。那时候它只是棵小树。如今它又高又大，枝繁叶茂，小鸟在枝叶间跳来跳去，吱吱喳喳，十分热闹。当年我的孩子小，还在树下玩，如今他们已经70岁了，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这些小娃娃叫我太爷爷。

一切都在生长变化，跟这棵树一样。我们里弄当年的孩子，有些出国成了实业家，还娶了外国太太，不回国了。有些当了教授。有些成了成功的股票生意人。也有些邻居搬走了。一切都在变化，就跟那棵原先是小树，如今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

我如今都90多岁了，还活着看到这一切，再过几年就将消失。而新的东西又会在下一代的脑海中留下。反正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一切在变，但愿越变越好，也一定会越变越好。

别想那么远了，看着窗前这棵树，我怀念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山间一束野芍药

□庞井君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大山里的野芍药总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她躲开了世人搜寻凝视的目光，远远地开在深山里，别的不说，单单那自由自然的精神气质就远非庭院里的花儿可比。花开时节，正值初夏，山山岭岭满眼都是单调的绿，蓦然有几朵红红的野芍药跳进你的眼帘，仿佛思念已久的人儿约好了在等你似的，让你欣喜不已。这情境偶遇一次，已然难忘。

然而，野芍药与我还另有一段特殊的因缘。30年来，一想起她，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也一起从遥远的童年飘了出来。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正是玉米拔节成长的时候，校长带领我们班到大队分给学校的几块很远的山坡地里去锄草。快到中午了，看看日头已毒毒地晒了下来，校长就叫大家休息一下准备回家。没了拘束，同学们便各行其是了。有的爬到树上摘山杏，一个个叫杏儿酸得龇牙咧嘴；有的跳进小溪里打打闹闹，弄得浑身是水；还有的追着几只刚出窝的小山雀，急得大山雀喳喳直叫。一时间，歌声、笑声、喧闹声飘洒在山谷林间。严厉的老校长一向是不允许我们这样自由散漫的，一阵大声的呵斥便把所有的人都聚拢到树荫下了。

我们刚刚坐下，气还没有喘匀，不知哪个眼尖的女同学惊喜地叫了一声，“快看，半山腰有芍药花！”大家顺着她的目光向山上望去，果然看到半山腰翠绿的灌木丛中，隐隐地开着几朵红红的野芍药。禁不住同学们的撩拨，禁不住那红红的诱惑，我一时忘了校长的训斥，跳起来，第一个朝半山腰冲去。几个胆大的男同学也像兔子一样跟着我往山坡上蹿。女同学则站起来，雀跃欢呼。我模模糊糊地看到校长从田里急急地钻出来阻止我们，也隐隐约约地听到身后传来他的叫喊声。但我早已将这些与耳边呼呼吹过的风声混在一起了。我用尽力气向山坡上奔跑，仿佛有一种压抑许久的力量迸发出来，灌木、野草和荆棘也丝毫未能减缓飞驰的脚步。我第一个跑到那红红的野芍药跟前，小心翼翼地将花儿连着枝叶一起采下，数

后死者的责任

□刘锡诚

老作家沙汀1978年4月30日写给我一封信，向我推荐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左联老作家任白戈写的一篇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我手发表在我当时任职的《人民文学》月刊1978年第5期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起因于李何林的一篇文章和随信提交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点声明》，从而引发了“文革”后新的历史形势下关于30年代文艺的论争。发表前，任白戈曾请茅盾、周扬、沙汀等文艺界老朋友看过文稿，帮他作了一些修改。为适应当时批判林彪、“四人帮”文化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文艺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行径，在发表时，我们将原题改成《坚决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对30年代文艺的诬蔑》，显得更有针对性。

3年以后的1981年3月17日，早已改换了门庭的我——1978年6月我转到了停刊十年后即复刊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又收到了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推荐任白戈另一篇文稿《〈徐懋庸选集〉序言》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锡诚同志：

白戈同志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徐懋庸选集》写了一篇序言，现介绍给你，请你转有关同志，希望能在《文艺报》发表。

四川人民出版社早已出有懋庸选集的计划，因为稿挤，一时没有发到工厂。去年底，三联书店也编了徐氏杂文选。也由白戈写了序言，且已发表过。

但听说两种选本内容不一样，两篇序言也完全不一样。白戈跟懋庸有五十年的友谊，他对徐是很了解的。因此，他的序写得有感情，也抓住了徐作的特点。这些观点，对今天也有意义。

稿子如何处理，请早一点告诉我。

麻烦你，谨致
敬礼

沙汀
1981年3月17日

徐懋庸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著名杂文家。他的杂文深得鲁迅之风，也得到鲁迅的器重与爱护。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站在了周扬的一边，并于1936年8月1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鲁迅抱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批评徐懋庸，使得矛盾公开化了。鲁迅逝世后，徐懋庸写了“敌乎友？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的挽联，表达他对鲁迅的悲痛之情。徐懋庸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既肯定这次论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也批评了他对鲁迅的不够尊重。由于曾遭到过鲁迅的批评和指责，徐懋庸在文学史上的名声受到影

响。我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里曾有一段话记述了这件事和我的观点：一旦被人批判，特别是被鲁迅这样的人物批评过指责过，在社会上就永难容身，这是一种不利于人才成长、不利于创造性发挥的社会环境。徐懋庸被鲁迅奚落和斥责，所以他的功也就被“过”所掩盖了，因为他无法辩驳；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晚年一直在忧郁中度过，1977年2月12日逝世。他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些出色的杂文，也很少被人提及和研究了。1978年12月，徐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纠正，恢复了党籍。作为徐懋庸的朋友，任白戈在他身后为《徐懋庸选集》作序，还他以本来面目。

任白戈1934年至1937年与徐懋庸一道在左联工作，1938年至1942年一道在延安抗大工作，他们之间有50年的友谊，对徐的为人和为文及其思想发展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我编发前述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的那篇文章时，对他和徐懋庸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而在收到他的这篇《〈徐懋庸选集〉序言》之前没有多少天，刚刚在《读书》杂志1981年第1期上读到了他为《徐懋庸杂文集》写的序。他在杂文集序里开宗明义写道：“我有幸被徐懋庸同志视为知己的后死者。在《徐懋庸杂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把我心中早就想说的一些关于懋庸的话倾吐出来，也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作为懋庸的老战友，将他的作品作一些介绍，实在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又在《〈徐懋庸选集〉序言》里写道：“我对徐懋庸的认识，是他这个人不是尖锐，而是尖锐，他尖锐而不刻薄，不是无情，而是有情，像个保温瓶，外面冷，热在心里。”余生也晚，无缘结识徐懋庸，而徐懋庸的遗孀王书同志，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却是认识的，也多少耳闻任白戈为《徐懋庸选集》作序的事，很为她高兴。在徐懋庸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之后，由作为“后死者”的“知己”任白戈出面给徐懋庸的文艺学术观及其革命文艺道路作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肯定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其时身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托我帮助发表任白戈所撰《徐懋庸选集》序言，也表现了这位老作家对已故文坛老友和战士徐懋庸的拳拳之心和怀念之情。我将其改题为《徐懋庸及其作品》，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14期上。如沙汀在给我的信里所说，任白戈的序写得有感情，也抓住了徐作的特点。他的文章、观点以及对故人的友情，对今天的文坛也是有意义的。

的冲力。小溪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边用来排洪，一边用来作为水碓推动的动力。水碓轮盘在水的推动下，吱吱呀呀地唱个不停，那很有节奏的杵米声此起彼伏，从不停息。不停转动的轮盘轴轮长满青苔，那水从轮盘轴上掉落，就像翡翠一样夺目晶莹。

沿石桥向东是一条长长的石头路，大概走200多米，就到了我就读的学校。夕阳西下，每次放学回家，我们就走在这石头上，路的两边是长势碧绿的水稻，时常可以看到父辈们牵着水牛在田间小路上吃草。稻田里不时跳起一只只青蛙。一群群鸭子在稻田里找寻食物，丝丝凉风吹拂着我们孩子的衣角，神仙一般的童年让我无忧无虑。几条伏在河边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看到我们归来不情愿地站起来，扬起尾巴，路边上不知名的野花随着微风起伏。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在晚霞中显得格外惬意。

晚霞中的村庄不时升起炊烟，伴随着炊烟而起的是饭菜的飘香，以及孩子们晚饭后在村里的土场上新一轮欢歌笑语。

这就是我的家乡，一个美丽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村子里的孩子们太会读书，一个个先后考出了村子。村子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失去变靛的机会，从而被破。而我所担心的却是不如有文化底蕴的村落消失。没有文化的房子是不会有灵魂的，顶多就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它很难让人产生联想，更不会给人留下回忆，这样的教训难道我们在造城运动中还不够深刻吗？多么希望我们高速运转的社会能更多地考虑到自然、文化以及人的灵魂，让传统文化离去脚步慢点再慢点，让乡村文化的传承久些再久些……